

# 锻造新的哲学武器 思想成其为力量的途径

## ——以对龚自珍的研究为例

陈其泰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北京 100875)

**摘要** 龚自珍思想的锐利批判锋芒,是嘉道时期极其复杂、严重的社会矛盾交织磨炼的产物,是经过三代人的社会阅历“淬厉”而形成的。正当清朝统治由盛到衰、危机四伏之时,需要有新的哲学观引导人们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龚自珍即以锻造新的哲学武器的使命自任,对今文公羊学派“三世说”作了革命性改造,这是其重大的历史性贡献。龚自珍有力地论证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倡导个性解放,因而成为“近世思想自由之先导”,对晚清思想启蒙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关键词** 龚自珍思想 公羊“三世说”哲学 晚清思想解放潮流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正面临着亘古未有的历史变局。中国的社会性质,清朝统治的秩序,对外关系的格局,以至思想学术的风气,都处于空前剧烈的变动中。彼时所处的是“盛世”还是“衰世”,国家民族的出路何在,乃是历史大转折时代向思想家提出的尖锐课题。睿智的哲人细心地体察社会的复杂矛盾,敏锐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既能从传统思想的精华中吸收营养,同时又能根据时代的需要,总结时代的智慧,并对之加以改造、发展,从而归纳、提炼出正确的政治、思想命题,锻造新的哲学武器,启发人们去认识时代的矛盾和社会前进的方向,并且由此产生出振聋发聩、冲破黑暗引导光明的力量。龚自珍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生前撰写的诗文,就成为处于封建末世、呼唤改革的时代风雷。

### 一、“百年淬厉电光开”

关于龚自珍倡导思想解放、开启晚清社会改革思潮的历史功绩,梁启超曾作了精当的评论:“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sup>[1]</sup>

梁启超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又对清代学术思想变迁有精湛的研究,他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评价龚自珍及其挚友魏源处在清朝统治陵夷、社会危机深重的时代,勇敢地抨击专制政治的黑暗,主张经世致用,向长期支配士人思想的朴学思潮挑战,独树一帜与之抗衡,因而具有震撼一般人耳目之威力,为思想界导引光明,其论述可谓鞭辟入里、切中肯綮。龚自珍的强烈危机意识和大胆改革主张,主要是得自天资聪慧,还是后天磨炼的结果呢?

龚氏对此曾作了明确的回答。其《己亥杂诗》中有云:“廉锷非关上帝才,百年淬厉电光开。”即是说,他对社会弊病的锐利观察和强烈的批判精神,绝非天生而具有的,而是长期观察历练、总结亲身感受的结果。特别是家世和环境给了他锻炼、教育的条件,对官场风气和社会状况的长期观察了解,才

淬厉了他文章中无与伦比的批判锋芒。

龚自珍一生的很大特点,是对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和深重危机,具有异乎寻常的敏锐感受。他少年和青年时期即随父亲到京城读书,19岁应顺天乡试,中副榜贡生,并以此资格入武英殿充任校录。龚自珍才华横溢,青年时代在京城即以高才闻名,但由于科举制度的腐朽,他连年应进士试都因楷法不中式而落第。至38岁时,才以第九十五名中榜,又因楷法不光洁,“三试三不及格”而不入翰林,这更使他深刻地认识到朝廷取士制度的腐败不堪。25岁以前,龚自珍即写出《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平均篇》等名文,对于清朝统治造成的社会危机进行深刻的解剖,对于专制统治的罪恶作了有力的揭露,有如寒光四射的利剑,直刺腐败政治的要害。

龚自珍十分痛恨当时官场盛行的投机钻营、阿谀逢迎、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等种种丑恶行为,针砭当时士林中蔓延的粉饰太平、无视民众疾苦的麻木状态和迂腐僵化的习气。《明良论》四篇,即以英拔之气初次展露他的深刻观察和批判锋芒。“冷署闲曹”,却有利于他对官场冷眼观察。他由于怀着经世治国的抱负,因而能够无畏地顶住同僚耻笑他是“狂生”、“有痼疾”的压力,“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sup>[2]</sup>。这四篇名文不仅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官僚集团种种丑态,更能深入实质,究其底蕴,透辟地分析官僚群体的心态特点,从制度上探讨官僚政治腐败的根由。龚自珍概述官僚集团的心理特点是献媚营私、丧失廉耻。越是身居高位,越是无耻献媚取宠:“官益久,则气越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身为大臣却处事卑鄙,把探听人主喜怒作为保官求荣的诀窍,“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而出,别求夫

收稿日期 2007-10-20

作者简介 陈其泰(1939—),男,广东丰顺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清代及近代学术史。

可以受眷之法”。营私谋利是他们的唯一目的,国家大事完全置之不顾,“苟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以退缩为老成,国事我家何知焉”!一旦国家有事,他们便像鸿燕一样飞得无影无踪。因此龚自珍斥责这班官僚是“求寄食焉之寓公,旅进而旅参焉之仆从,伺主人喜怒之狎客”,已经堕落为完全对国家社会丧失了责任感的寄生阶层。他痛心疾首地揭露整个官僚士大夫集团一心投机钻营、不顾廉耻的实质和危害:“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辱。”<sup>[2]</sup>

龚自珍进而历数官吏选举制度的积弊。他指出,清朝实行的“停年之格”,即官吏升迁完全限于年数、资历的制度,“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造成人才的被压抑,碌碌无为者身居高位,“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熬到最后当上宰辅、一品大臣的官员,“其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疲矣”。这种用人制度的严重恶果,必然是进取精神的被窒息,整个社会失去活力。正如龚自珍所痛切分析的:“英奇未尽之士,亦卒不得起而相代。”“至于建大猷,白大事,则宜乎更绝无人也。……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sup>[2]</sup>这些切中肯綮的话,表明龚自珍早在近代史前夜,就已经尖锐地提出了论资排辈的官僚政治造成行政机制严重老化的大问题。龚自珍发扬公羊学家以治国经世为抱负的精神,才使他有如此深刻的观察,提出如此犀利、卓越的见解。龚自珍外祖父段玉裁是著名的古文学家,他精于训诂考证,但一生的阅历毕竟使老人对于社会矛盾和弥漫朝野的恶浊风气深有所感,因此,他读了此文后,非但没有责备外孙离开古文训诂的治学道路,正相反,他表示高度赞赏自珍切中官场病症的有力批判,称:“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髦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sup>[2]</sup>

## 二、锻造新的哲学武器 对公羊学说的革命性改造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sup>[3]</sup>嘉庆、道光时代,是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转折时代,急迫地需要有新的进步的哲学思想,来启示人们探索摆脱危机、通向未来的道路。龚自珍生活的年代,正当清朝统治由盛转衰,并且在下坡路上急速滑落,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危机四伏。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大官僚、大地主占田多达几千顷至几万顷,而贫民则几无立身之地。

龚自珍所处的历史变局,不仅标志着清朝统治由盛到衰,而且是整个中国历史进程和学术风气的转捩点。在嘉道以前,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阶段。至鸦片战争前夜,封建专制统治早已腐朽,风雨飘摇,它扼杀新生力量的成长,严重阻碍社会前进。龚自珍和魏源作为新生力量的代言人敢于冒险犯难,置黑暗势力的仇视、迫害于不顾,“短刀直入”地将这黑暗得使人窒息的沉重的铁桶捅开一个缺口,让少许新鲜空气和熹微的曙光开始透过来。在18世纪,朴学(古文经学)在特殊条件下取得了繁荣,学者辈出,“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sup>[4]</sup>。文献典籍整理、考证训诂之学达到鼎盛,从具体学术领域来讲,研究工作超越前人,而从关心现实、推动社会进步而言,比起清初学者来,则是明显的倒退。到了后来,考证学的末流,更沉溺于琐屑问题的考证。这种学风无益世事的严重弊病,经过白莲教起义事件更加暴露出来,这样一次波及范

围广阔、使清朝统治受到“痛深创巨”打击的起义事件,竟然没有从当时学者们的论著中得到反映!这充分说明当时学者脱离实际之严重程度。至鸦片战争前夕,民族危机更加深重,面对着“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sup>[5]</sup>的危险局面,学术还能不走出象牙之塔?!因此,至鸦片战争前后清代学风出现了新的转折,乃是时代之必然。

嘉道时期学风的转变,从哲学意义上,是今古文经学地位划时代的变化。从东汉至乾隆时期,古文经学处于尊崇的地位,今文经学则消沉无闻;自鸦片战争前夕至清末,今文经学重新崛起,并风靡于世。

龚自珍锻造新的哲学武器,其实质,便是警告“衰世”到来,“乱将不远”,让人们从醉梦升平中惊醒起来,急图改革,挽救社会危机。这恰恰证明了马克思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sup>[4]</sup>今文公羊学派的哲学经过东汉末何休的总结,提出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公羊家哲学具有强烈的变易、发展观,反对以静止、凝固不变的观点看世界,主张用变化递嬗、朴素进化的观点观察社会变迁;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主张“以经议政”,主张“改制”,“为后王立法”,要规划天下大计,制定一套治国方略;它强调阐发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重发挥、重创造,因此可以在合法的形式下容纳新思想。龚自珍对公羊家哲学的精髓有精到的把握,对时代危机的深刻感受更使他充满历史使命感和哲学创造精神,他呼唤时代的风雷,倡导实行社会变革,为国家民族从危机中寻找出路。其最大贡献是将原有的“三世说”改造成为“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警告“衰世”已经来临,时代大变动就在眼前!

龚自珍青年时期写有著名的《尊隐》一文。他对此文异常重视,直到晚年,还自豪地写下“少年《尊隐》有高文,猿鹤真堪张一军”的诗句。在这篇寓言式文字中他巧妙地运用象征和隐喻手法,以“三世说”来描绘专制统治的濒于灭亡,把社会危机随时将要爆发这番抽象道理,形象化地变成几乎是伸手能触及的情景、耳际能听到的呼号。他用“早时”、“午时”、“昏时”来象征封建统治的三个阶段,称“岁有三时:一日发时,二日怒时,三日威时;日有三时:一日早时,二日午时,三日昏时”。当其早时,“夫日胎于溟滓,浴于东海,徘徊于华林,轩轳于高阁,照耀人之新沐濯,沧沧凉凉,不炎其光,吸引清气,宜君宜王”,象征着统治集团处于上升阶段,专制皇权所在的“京师”有力地控制全国。至日之午时,“乃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饮和气,宜君宜王,丁此也以有国,而君子适生之,入境而问之,天下法宗礼,族修心,鬼修祀,大川修道,百宝万货,奔命涌塞,喘车牛如京师,山林冥冥,但有望士,天命不犹,与草木死”。此时统治集团仍然有力量控制局面,制度、秩序尚未崩坏,“京师”仍是集中全国财富和吸引人才的中心,那些处境窘迫不得志、代表在野势力的“望士”仍然不能构成对当权者的威胁。到了“昏时”,不思进取的当权者已经到达穷途末路,整个社会美与恶、是与非都被颠倒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丁此也以有国,而君子适生之,不生王家,不生其元妃、嫔嫱之家,不生所世世豢之家,从山川来,止于郊。而问之



曰：何哉？古先册书，圣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杰所成，如京师，京师弗受也，非但不受，又裂而磔之。丑类窳劣，诈伪不材，是桢是任，是以为生资，则百宝咸怨，怨则反其野矣。贵人故家，尝之宗，不乐守先人之所予重器，则窳人子篡之，则京师之气泄，京师之气泄，则府于野矣。”当此之时，眼光锐利、有所作为的人才都生于民间，他们才是真正有希望的力量，他们非但不被信赖，反而受压迫、受摧残，卑劣龌龊的小人却受到重用，完全是黑白混淆、理性泯灭、诈伪横行的可诅咒的时代。于是，代表统治者的“京师”与代表在野力量的“山中”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京师之气泄，则府于野矣。如是则京师贫，京师贫，则四山实矣。……如是则豪杰轻量京师，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矣。如是则京师如鼠壤，如鼠壤，则山中之壁垒坚矣。”到最后，统治集团陷于孤立无助，山中之民则齐心协力，一呼百应，时代大变动就要发生了。“京师之日苦短，山中之日长矣。……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馀言，但闻鼙声，夜之漫漫，鼙且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sup>[2]</sup>这并不是龚自珍的臆想，而是他根据历史经验和接连发生的起义事件而作出的预言，“山中之民”是什么人，没有明说，实际上应包括隐于野的有不满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数量众多的农民群众。龚自珍死后不过十年，果然爆发了惊天动地的太平天国起义。这篇以寓言形式写成的《尊隐》，和他所写的匕首投枪式的政论、史论一样，以其观察社会危机的深刻性震动人心，他对时代风暴行将到来的预言为此后的事态发展所证实，对于后来的维新派人物更是有力的启迪。

在大约写于同一时期的《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一文中，龚自珍又将自己对当代历史的观察总结为“治世——衰世——乱世”的“三世说”历史观，断言封建统治已经到了“衰世”：

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一。……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sup>[2]</sup>

龚自珍称“深于《春秋》者”，显指西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龚氏提出“治世”、“衰世”、“乱世”三世说，既是取法于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划分春秋为三世的理论，同时又是出于他本人对现实社会深刻观察而得出的新概括。他利用公羊学资料而锻造现实斗争所需要的哲学思想取得了出色的成果，昭示着社会的动向，标志着公羊学发展史上的巨大飞跃。在举世昏昏如梦如痴的时候，他却深刻感受到社会危机的深重，忧虑憔悴、日夜不安，为了唤醒人们，大声疾呼。他刻画衰世的种种特征——“黑白杂而五色可废”，“道路荒而畔岸隳”，“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从表面看似似乎仍然太平无事，而实际上却是黑白混淆，清浊不分，社会没有出路，真才横遭摧残。一旦出现有头脑、能思考、有廉耻心的“才士”、“才民”，那般奸佞邪恶之徒立即用种种手段将之扼杀。“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因此他发

出有力的警告：“乱亦将不远矣！”龚自珍进一步描绘了一幅社会行将解体的惨状：

履霜之屨，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癘之疾，殆于痛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

只有置身于危机深重的社会现实之中，才会产生如此惨痛的感受！

推动龚自珍运用公羊学说进行新的哲学创造的力量，是要为危机时代寻找出路。这就是他所说的纵观三千年历史的优秀史家，负有“忧天下”、“探世变”<sup>[2]</sup>的责任。“变”是乾隆末年以后由盛到衰转折时代的本质，龚自珍以他深刻的洞察力抓住了这一“变”的特点。公羊学说中阐发历史必变的思想资料，正好与这种时代特点相沟通，对它进行改造和发挥，便成为指导人们认识晚清历史潮流趋向的有力理论武器。

### 三、论证改革是历史的必然，倡导个性解放

变革旧制度，挽救危机，寻找自救自强之路——这是嘉道以后中国社会的方向和主流。龚自珍成功地对公羊哲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这就使他对这一时代方向的认识，比同时代人更加深刻，站在了更高的高度，因而成为近代改革派的前驱。他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主张，由于紧扣时代的主题和体现出鲜明的近代价值观，因而有力地振动了晚清进步人士的心弦，成为晚清思想解放的源泉。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七》这篇著名政论中，龚自珍深刻地总结出实行变革是历史的必然规律，由于他是从历史必然规律的高度来论述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的，因而他的论述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他尖锐地指出：没有八百年不亡的一姓王朝，但是天下有万亿年不变之道，这就是死守祖宗的老办法必定灭亡！从夏、商、周以来的历史反复地证明：时代变了，老办法就弊端百出，再也行不通，众人要求改革的愿望和议论是无法抵挡的。所以他警告清朝当权者：不改革必将衰败、灭亡。与其不思进取、坐等灭亡，何如奋发振作、改革图强！

龚自珍在另一名文《平均篇》中，表达出对社会危机的敏锐观察和警告。他认为，由于土地集中恶性发展，贫苦农民丧失土地、生计无着，这种财富占有的严重不均，正是社会危机的根源：“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衰之数，直以是券矣。……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或以羡慕，或以愤怨，或以骄汰，或以嗇吝，浇漓诡异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燹，为疫疠，生民喑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sup>[2]</sup>只有对清代嘉、道时期严重的土地兼并和流民问题有敏锐观察和深刻体验，才会发出如此沉痛的呼号！所以，龚氏呼吁对土地占有现状实行改革，目的是要做到大体的平均。

道光九年（1829年）他参加进士廷试时作《御试安边绥远疏》，便是效法王安石向皇帝上书，规划天下大计，向道光皇帝提出的施政、用人、水利、治边等改革主张。其中，有两项重要内容：一是反复陈述清代边疆形势与前代大不相同，“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汉唐时代的“凿空”、“羁縻”办法已完全不适用了；今天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加强国家统一、实现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有效管理、在新疆建立新的政治体制，“疆其

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二是针对刚平息张格尔叛乱这一事件,“臚举时事”,“直陈无隐”,批评清廷为了平叛从二万里以外的东北调派军队,结果劳师糜饷,骚扰州县,“兵差费至巨万”,“故曰甚非策也”<sup>[2]</sup>。因此建议加强伊犁索伦驻军的训练,以防备边疆地区再度发生不测事件。这些一针见血的见解,却使“阅卷诸公大惊,卒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sup>[2]</sup>。他又曾在《上大学士书》中,明确无疑地论述改革方向的不可逆转:“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sup>[2]</sup>这同他发挥《易经》和公羊学变易哲学而得出的“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的大胆预言一样,都完全被晚清历史前进的方向所证实。

封建专制制度束缚人的自由、窒息人的思想、泯灭人的个性,龚自珍以勇敢的姿态予以猛烈抨击,倡导个性解放,这同样是对旧制度和旧价值观的有力冲击。他所写的散文名篇《病梅馆记》一文,以梅为喻,而寓意至深。实则从个性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造成社会价值观念和民族心理畸形化、病态化的严重问题,即:专制统治者束缚和扼杀正直的、健全的人性成长,使之扭曲变形,造成当时普遍存在的奴才性、虚伪性、谄媚性,并以此为荣,以此为贵,竞相效法。这种深刻的思想,龚自珍是用文学的形象化手法来表达的,所以更加哀感动人,成为近代文化史上脍炙人口的名篇。龚自珍以隐喻的手法,对专制统治者摧残人性发出沉痛的控诉!他发誓对这些病梅要“疗之,纵之,顺之”,“解其棕缚”,“必复之全之”<sup>[2]</sup>。在与专制黑暗势力和卑污社会心理的顽强斗争中,他提出了一种闪烁近代思想光芒的崭新价值观,呼吁保存和恢复人性,追求个性的解放。

龚自珍还专门撰文论述个人利益的合法性,这同样是进步公羊学家重视哲理思考结出的硕果,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论私》一文用醒目的标题亮出自己的旗帜,毫不掩饰,批判锋芒直指满口“仁义道德”、“至公无私”的伪道学。龚自珍从自然界、生物界和社会现象,多方面说明“私”的存在天经地义。“天为闰月,以处赢缩之度,气盈朔虚,夏有凉风,冬有燠日,天有私也;地有畸零华离,为附庸闲田,地有私也”<sup>[2]</sup>。圣帝哲后,所谓“庇我子孙,保我国家而已,何以不爱他人之国家,而爱其国家?何以不庇他人之子孙,而庇其子孙”?“忠臣何以不忠他人之君,而忠其君?孝子何以不慈他人之亲,而慈其亲?寡妻贞妇何以不公此身于都市,乃私自贞私自葆也?”并进一步认为,如果按照那班假道学所标榜的去做,只能与禽兽无异。因为,“禽之相交,径直何私?孰疏孰亲,一视无差。尚不知父子,何有朋友?若人则必有孰薄孰厚之气谊,因有过从宴游,相援相引,款曲燕私之事矣”<sup>[2]</sup>。这里他举出动植物界做例子,并不恰当,但他的意图是要证明在道德观念上应该承认“私”的合法存在,并认为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公私并举”,这些又都是独到的进步见解。这些言论,继承了明代思想家李贽的观点而有所发展。这种论证个人利益合法性的言论在明清出现不是偶然的,在客观上,它反映了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因素正在生长,商人和手工业者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挣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在经济上获得发展。经典作家曾指出人

类私欲对于历史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恩格斯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造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sup>[3]</sup>恩格斯的话有助于我们认识到:龚自珍在封建末世论述个人利益的合法性的确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 四、结语

龚自珍晚年,在《己亥杂诗》中写有两首脍炙人口的诗句:“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齟齬,但开风气不为师。”“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前一首,是对他身处转折的时代而为思想学术界开创了一代新风气表达出充分的自信。后一首,是他深沉地呼唤出现迅烈的时代风雷,冲破这万马齐喑、危机深重的可悲局面,开辟出一条民族自救的生路。对于龚自珍这样一位卓越人物在思想史上地位的评价,不能只局限在嘉、道年间这一狭小范围内。龚自珍的开风气和呼唤时代风雷,乃是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大胆地批判专制制度的腐朽和暴露当时思想风气的恶浊,憧憬一个变革、进取时代的到来。在锻造新的哲学武器、提出新价值观和倡导学术风气的转变上,龚自珍都有披荆斩棘开创之功。因此,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读他的著作,仍然感到有思想的火花在闪耀,具有强烈的震撼力量。

对于龚自珍言论的这种“超前性”特点,处在两个世纪之交的进步人物,是有深刻的感受的。维新巨子梁启超的评论即最有代表性。饶有兴味的是,甚至清末顽固派营垒人物,也以痛切的心情,把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清朝灭亡的历史变局,归结到由于龚自珍所倡导的新思潮所引发。叶德辉即是一个突出代表。在《郎园北游文存》中,其论云:“曩者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后生晚进,莫不手先生(按,指龚自珍)文一编。其始发端于湖、湘,浸淫及于西蜀、东粤,挟其非常可怪之论,推波扬澜,极于新旧党争,而清社遂屋。论者追原祸始,颇咎先生及邵阳魏默深二人。”叶德辉本意要归罪于龚自珍,实际效果则相反,恰恰从反面证明龚自珍的主张对于晚清社会发展的巨大功绩。梁启超从进步派的角度“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先导”,叶德辉从顽固派的角度“追原祸始”,两人从对立的角度出发而竟能得出共通的看法,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龚自珍呼唤社会变革的时代风雷,确确实实开创了晚清思想解放的潮流,有力地推动了晚清的历史进程。

#### 参考文献:

-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